

雅言俗語的消長與雅俗文化的互動

周 荐

[提 要] 雅言伴隨著書面語出現，形成了它與俗語的對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兩者彼此適應。歷史和現實存在著雅俗文化的角力，語言因而也存在著雅俗的消長變化情形。將漢語詞彙的雅俗消長情況與中國雅俗文化的發展歷程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可略窺中國士大夫階層對雅俗文化和雅言俗語的不同取態，亦可看出語言發展原動力的樣貌。

[關鍵詞] 文化 雅言 俗語

[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2 - 0119 - 07

一、俗語是與雅言相對的概念

任何一種歷史悠久的語言都有雅俗之分。書面語的出現造就了雅言。雅言未出現時，語言是無所謂雅，也無所謂俗的。雅言的出現，造成了它與俗語的對立，也強化了這種對立。

漢語的雅俗之分，早在先秦即已存在，並引起了時人的關注。《論語·述而》有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所謂的“雅”是“雅正”的意思，“雅言”是“雅正的語言”，含規範語言之意。凡正統的，為統治階級所喜、所用的，便是雅正；凡出自統治階級之口的語言要素（語音、詞彙、語法），聽起來便是雅正的語言——雅言，全社會必須作為遵從的規範。在孔子看來，雅言及雅樂等都因周天子這位正統的統治者而雅，所以孔子“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與“雅正”相對的概念，自然就是不規範的、“俚俗”的，不登大雅之堂。凡販夫走卒所用的，或方言裡流行的，便被視為俚俗。正因此故，古籍中引用的諺語、名言，儘管其中的一些在後世人們的心中並不俗，甚至已演變成典雅的成語，卻被當世的人們（尤其是士大夫階層）視為俚俗的語言成分，稱之為“俚諺”、“俚語”、“俗語”、“俗諺”等等。

孔子的這一思想影響久遠，我們今天似仍在自覺不自覺地受著它的影響。如各級政府每年的工作報告和各類公文中，鮮見慣用語、歇後語等俚俗詞彙的蹤影，因為人們似覺俚俗的詞語與政府公文的嚴肅性難以兼容；人們在用漢語進行交際交流的場合，一般喜用普通話的詞語單位，而不大喜用方言詞彙，儘管有時方言詞彙的表達可能來得更恰當、適切，這是由於人們或認為方言詞彙難登大雅之堂，不能像普通話那樣表現出說者的文化修養；最近一段時期以來，

從網絡向全社會散佈開來的網絡詞語，雖廣為網民使用，但因有的十分俚俗，已遭一些學者批評。^①這些都說明，傳統上的語言雅俗觀，歷久彌新，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遵照去做。

當然，孔子倡導的語言雅俗觀今天看來是否完全合適，還可研究。比如表示一個事物對象時，若共同語和方言中都有一個詞語單位來稱說，用共同語詞語，不用方言詞語，是可以的，也完全應該，因為畢竟漢民族共同語是中華全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語，使用共同語當然比使用任何一個方言都合適，它能夠最廣大的受眾所理解和接受；但是，若共同語中沒有合適的詞語，方言中有，那就不但可用該方言詞語，而且不能就認定該詞語俗而不雅。如粵方言中的“三姑六婆”（好管閒事的女人）、“古靈精怪”（稀奇古怪）、“十問九唔應”（屢問屢不答）、“一部通書睇到老”（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閩方言的“常來狗毋吠”（人常來訪，狗都認得）、“一枝草，一點露”（上帝公平對待萬事萬物）、“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拜田頭”（做人要飲水思源），客家方言的“爛船也有三斤釘”、“人善人欺天不欺”、“天上雷公，地上舅公”、“榜上無名，腳下有路”，吳方言的“一塊補丁十塊金”、“人小鈿多，飛來橫禍”、“蝦有蝦路，蟹有蟹路”、“貨比銅鈿硬，難逃滌墅關”，都是各自方言中的語言珍品，能夠表現漢民族共同語難以表現的對象和詞采。其中一些，甚至有被共同語吸納的資格，如粵方言的“三姑六婆”、“古靈精怪”，客家方言的“爛船也有三斤釘”，吳方言的“蝦有蝦路，蟹有蟹路”。

雅言和俗語，均可分出一些不同的等級。雅言，似可分出典雅（如宮廷語言）、文雅（士大夫階層的語言）、閒雅（有閒階層的語言）三個層級；俗語，亦可分出淺俗（市井百姓的語言）、俚俗（插科打諢的語言）、粗俗（辱罵性的語言）三個等第。人因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等不同而有等級，雅、俗語言的使用，一般都與使用者的身份（階級階層、文化修養等）大致相當。雅言本身多適宜表現雅文化，俗語本身多適宜表現俗文化。

語言的雅俗，由構成它的語音、語法尤其是詞彙來體現，表現在該語言的各個構成要素上。語音上看，一些字有文白異讀，反映出雅俗之辨，例如“薄”有 bó、báo 兩讀，“削”有 xuē、xiāo 兩讀，都是前者文，後者白。語法上看，句式古舊顯得雅，句式新潮顯得俗，前者如“額手稱慶”、“馬首是瞻”，後者如“跟著爹爹邊哼小曲邊溜小跑去趕集”，兩者雅俗分明。詞彙的雅俗，可循四條線索去考辨：一是單音詞有雅俗之分，一般而言，古舊而常用於聖賢書的，易被視為雅，反之則易被看作俗；二是單音詞與複音詞相比，古人多認為單音詞雅而複音詞俗；三是複音詞中，音步平穩的偶數音節詞語，尤其是四字詞彙單位，因其具有結構上對等聯結的特點、語音上音步平穩的優勢，適宜表現雅的內容，而奇數音節詞語，則適合表現俗的內容；四是詞長不同的詞語比較，字數簡短的詞語，易被歸入雅類，字數較長的詞語，易被歸入俗類。

漢語詞彙的雅俗分別，在詞彙還是單字詞為主的時代即已存在。三代已有的字，尤其是為統治者認可的字，正統而雅；後世造出的，尤其是民間自造的字，非正統且俗。明清前，在士人心目中，具正統地位的語言單位是字，而非由字與字合成的詞語，儘管複字詞語自上古與中古之交大量產生後，經一千數百年發展，其時已逐漸在人們心目中取代字的地位。後出的身份，導致複字詞語雅性質直到清末前後，尤其是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才終於被徹底肯定下來。

複字詞彙中，偶數音節的詞語多表雅的內容，奇數音節的詞語多表俗的內容。已推出近六十載的《現代漢語詞典》以〈書〉符表雅語體，以〈口〉或〈方〉符表俗語體，前者如“領首”、“浩瀚”、“鑒諒”、“落拓”、“空空如也”、“門可羅雀”、“目無餘子”、“身無長物”，後者如“攪和”、“頭晌”、“糊弄局”、“花插著”、“繞脖子”、“身子骨”、“灰不溜丟”、

“稀裡糊塗”、“換湯不換藥”、“臉紅脖子粗”、“胳膊肘朝外拐”、“陳穀子爛芝麻”。諺語如“死豬不怕開水燙”、“剃頭擔子一頭熱”、“尿不到一個壺裡”、“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歇後語如“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等，一般不為《現代漢語詞典》這樣的規範詞典所收，因為它們俗，也因為它們詞長參差不齊，不具詞感。

雅俗詞語間未必永遠存在鴻溝，俗詞語或存在著向雅詞語轉化的可能。今日的一些雙字詞和四字成語，在歷史上是俗而不雅的，然經千百年迄於今日，人們不覺其俗反覺其雅。例如“攘臂”、“正旦”、“嫋嫋婷婷”、“震古鑠今”，並非歷史上的雅詞語，“欲投鼠而忌器”、“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更是古代的俗諺，但由於語言的發展，今人已不覺其俗了。^②

二、學人對俗詞語有不同的關注度

中國人編纂詞典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周秦之際的《爾雅》，熟語搜集、整理和研究，唐宋肇端，代有其人，不乏名著：唐有李義山《雜纂》，宋有無名氏《釋常談》，龔熙正、吳子良《續釋常談》等；逮明清，迎來了豐收季，明有陸嘯雲《世事通考》，陳士元《俚言解》，郭子章《六語》等，清有梁同書《直語補正》，陳鱣《恆言廣證》，胡式鈺《語寶》，高敬亭《正音撮要》，以及李光庭《鄉言解頤》和王有光《吳下諺聯》等。清朝建政初期的震盪過後，政權漸趨穩定，人心思治，統治者也急需一個祥和的社會，於是知識分子重拾舊業，投身到文化建設中來。但清統治者擔心政權不穩，文字獄屢興，這令士大夫噤若寒蟬，只能將精力轉投到故紙堆中去，不約而同地展開了對小學的研究。乾嘉學派，在乾、嘉兩朝達至鼎盛。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中心，並認為儒家典籍愈古愈真，其小學研究的重點始終是典雅的經典而非俚俗的詞語。由於學者對經典研究紮堆，人數眾多，逐漸的一些有識之士主動將研究目光投放到以往大家較少關注的俚俗詞語上。明清以來全社會關注的中心也由貴族開始向下層人民轉移（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大名著”在明清正式成書即是佐證），儘管這種轉移有著諸多的不情願，轉移的速度又非常之緩慢，但畢竟轉移已在進程中。這導致下層人民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關注。關注這些的學者，不光有上述專注於俚俗詞語研究並以此名於後世的學者，也有當世的著名小學家，如錢大昕（其俗語代表作是《恆言錄》）、錢大昭（其俗語代表作是《邇言》）以及翟灝（《通俗編》）。

《通俗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系統、有規模的漢語詞典。《通俗編》成就非凡，但在翟灝本人眼中，他所搜集的複字詞彙單位都是“通俗”的，所以他為書取名《通俗編》。從該書收條不難看出，雙字詞已成為當時詞彙中的重要單位。也需注意的是，四字成語和三字詞彙單位已大量產生出來，到明清蔚為大國。四字成語和三字詞彙單位大量湧現緣於士大夫階層和市井階層對文化蓬勃發展的要求，而四字成語和三字詞彙單位的結構本身也正反映著這種雅俗文化的對立。四字成語和三字詞彙單位，它們的表義機制是與典雅的正統文化和俚俗的市井文化相適應的。如今日常用的“見賢思齊”、“巧言令色”、“天道酬勤”、“文質彬彬”就出自儒家經典《論語》中，宋以後人們開始稱這類典雅的詞彙單位為“成語”。古人用“成語”一詞指稱“精衛填海”、“黔驢技窮”、“宵衣旰食”這類單位，未必就如後世那樣明瞭其典雅的語體特徵，更未為其專劃出一個語類來，“成語”的叫名或只指出它們是源出於某部經典著作的成句。“撈稻草”、“穿小鞋”、“碰釘子”、“打秋風”等三字詞彙單位，出現在宋或宋之後，明清開始更批量產生，如清王有光《吳下諺聯》所收的“百醜圖”、“步步高”、“吃白食”、“回味甜”、“開盤笑”、“十

樣錦”、“受清齋”、“吸西風”即是。《通俗編》所收的三字詞彙單位，從所表達的事物對象上看，有不少是當時的曲目，如“王昭君”、“崔鶯鶯”，時人的飲食和飲食習慣，如“醉如泥”、“勸雙杯”，時人的服飾，如“東坡巾”、“煙氈帽”，時人特有的家俱等用具，如“太師窗”、“礮礮子”，時人的娛樂玩耍等習俗，如“拜星斗”、“染鬚髮”，時人的宗教習俗，如“城隍神”、“二郎神”，時人的婚喪嫁娶等習俗，如“下財禮”、“戲新婦”。現代更有人彙編過《漢語慣用語大辭典》，^③收條近萬，如“吃豆腐”、“吃黑棗”、“戴高帽”、“刮地皮”。被稱作“慣用語”的這類語，多俗而不雅；“慣用語”的叫名，也是1960年代後才出現的。“文革”十年，雅文化受到排斥，表現雅文化的成語，幾乎沒有一個新造出來，而俗文化卻得以大行其道，反映俗文化的俗語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造出，如“變色龍”、“牆頭草”、“逍遙派”、“小爬蟲”。^④“文革”結束後，社會重新步入正軌，雅俗詞語才重獲此消彼長的發展。

古人所造並流傳下來的四字組合多典雅，少俗白。這是因為能夠憑藉書面流傳下來的多是為士大夫看重的典雅的單位，而出現在下層百姓口頭上的鮮活、俗白的單位卻往往不為士大夫所看中而記錄並流行開來、流傳下來。典雅的四字組合單位，絕大部分為現代人所繼承，成為了今日所謂成語。雖然古代的士大夫更為關注的是典雅的詞語，自覺不自覺地排斥俗白的詞語，但還是有有識之士敏銳地看到了詞語的雅俗問題，並為其作出了成功的分類。清易本焯《常譚搜》（同治三年[1864]京山易氏刊本）首次將語言詞彙單位分別為雅和俗。該書共四卷，收詞和熟語1,348條，卷一、卷二為雅類，收666條，卷三、卷四為俗類，收682條。雅類、俗類條目數量基本持平。複字詞有雅有俗，是易氏之前從未有過的認知。從是書不難看出，雙字詞彙單位有雅有俗，四字詞彙單位多為典雅的成分少為俚俗的單位。雖然是書為雅、俗詞語所作的分類未必能得到今天所有學者的首肯，但它首次勾畫出詞語的雅俗類別，功不可沒。現代人所造的四字組合，有典雅的，如“歐風美雨”、“火中取栗”，有俚俗的，如“灰不溜秋”、“嘻嘻哈哈”，更有語意直白的。語意直白的四字組合，多為反映現代科技、文化、事物創造出來的。這類新創造的四字組合被稱作“專有名詞”。也就是說，在學者眼裡，它們不是成語，而是詞，如“安全剃刀”、“百科全書”、“第三產業”、“高等學校”、“黃金時代”、“機械效率”。此類四字組合不僅語意直白，結構也並不如成語那樣緊密，可借用“仿語”這個語言學術語稱之。

中國學者關注俗語，似不如西方來華傳教士那麼主動積極。傳教士編纂的詞典，不光關注詞，有的也把目光投放到俗語上。利瑪竇之後的天主教傳教士多致力於漢語語法研究，也有人注意到漢語俗語的收集，特意編寫成漢語學習手冊。如17世紀中至18世紀初由無名氏耶穌會士編寫的手稿，後於1854年在倫敦出版，名為《四字文箋注》，該書彙列1,463條四字短語，並配以英語和法語解釋。^⑤天主教遣使會傳教士江沙維編纂的《漢字文法》（澳門聖若瑟修院，1829）不僅是澳門聖若瑟修院漢語教學的重要教材，而且對西方人的漢語學習以及其後的漢語語法書的撰寫有著重要的影響。該書專設第六章“俗語”，列357條，包括“千日砍柴一日燒”、“光棍不吃眼前虧”這樣的諺語，“陰天曬被褥——白搭”、“馬尾兒穿豆腐——提不起來”這樣的歇後語。

三、雅俗文化推動著雅言俗語的發展

鄭振鐸先生認為中國俗文學史發軔於先秦，^⑥但中國的俗文學，在唐後，尤其是在宋元勾欄瓦舍的文化中才迎來大發展時期，應無疑義。市井文化催生出說唱文學，與之相適應，漢語中也批量出現了俗語。此一時代生出的俗語有兩類引人矚目，一類是歇後語，一類是人稱“慣用語”

的三字詞彙單位。中古與近代銜接時期產生的俗語，歇後語是典型代表。歇後語最早產生於唐，時人有歇後詩。如彥謙《題漢高廟》“耳聽明主提三尺，眼見愚心盜一抔”分別歇去了“劍”和“土”。是為歇後。後人據前人詩而成的歇後詩，更為常見，如韓愈《遣興》詩的“斷送一生惟有酒”句，《贈鄭兵曹》詩的“破除萬事無過酒”，北宋黃庭堅《西江月》分別化用為“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成為歇後詩。歇後詩還不就是歇後語，歇後語是歇後詩走向民間，進一步俗化的產物。從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甚至明中葉，在長達二三百年間逐漸成書的《水滸傳》，書中有大量歇後語，如：“武大郎的扁擔——長不了”、“西門慶請武大郎——沒安好心”、“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好大的力氣”。二十世紀初喊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的五四運動，使俗文化獲得了長足發展，歇後語作為民間重要的俗語，隨處可見，隨口可造。與歇後語幾乎同時迎來大發展機遇的還有被稱作“慣用語”的主要由三字構成的俗語，如“穿小鞋”、“碰釘子”、“打秋風”、“吃白食”。它們自唐開始出現，宋元後獲得蓬勃發展，近現代蔚為大觀。

不可否認的是，雅文學是幾千年來貫穿整個中國社會的正統的官方文學。雅文學是用先秦兩漢以來典範的文言文為語言表達工具寫就的，不論語法還是詞彙，它們既不是口語隨意的，一般也不是綺靡浮華的。它積澱久遠而深厚，表現豐贍而厚重，深受各族各界各階層人士喜愛，為後世所遵從，也為世界各國漢語使用者愛重。雅文化背景下的雅言詞語，不僅在整個漢語詞彙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作為古人集體創造的一項豐厚的文化遺產留給下一代，再由各自時代的人們發揚光大。代表雅文化的雅文學，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始終居主導地位。例如《詩經》是先秦時代產生的記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詩集，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而豐厚的文化財富、思想財富、語言財富。若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比作一幅璀璨的歷史畫卷的話，畫卷打頭的最璀璨奪目的一章，《詩經》當之無愧。《詩經》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性經典著作之一，漢時被列為“五經”之首，唐時的“九經”和宋時的“十三經”也都將其收列其中。歷代士子讀書，《詩經》是必讀書，通往宦途的科舉考試，《詩經》也是必考內容，可見其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影響之大。從語言上看，《詩經》前，金文的銘文中很少有整齊劃一的四字形式；再以前，殷商甲骨文中四字連綴的形式也不常見。因此，四言為主、形式整齊的《詩經》語言的出現，是漢語高度成熟的表現，給當時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力。《詩經》之後，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學說、學派林林總總。思想解放帶來了語言形式上的解放，記錄各家學派思想、學說的書文以散文的語言形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那就是諸子的散文和散文體的詩歌——《楚辭》。詩的語言畢竟不同於散文的語言。詩的語言凝煉而典雅，它字約意豐，既給人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間又不允許思想無拘無束任意馳騁，給人以美的感受。人們喜愛四字格的詩的語言形式，它符合華人形成既久的重偶輕奇的語言心理。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時代動盪後，《詩經》語言不僅未為散文語言所取代，《詩經》式的詩語不但沒有被《楚辭》式的詩語所代替，反而在當時獲得了獨領風騷的地位，並且給了後世以極大的影響。漢魏四言詩（代表作如漢曹操《觀滄海》）和六朝以降的駢文（代表作如唐王勃《滕王閣序》）的語言形式，應該說都與《詩經》的語言存在承繼關係。在散文潮洶湧澎湃的春秋時代，《詩經》以典雅的語言、齊整的韻律，奠定了其作為四字格雅言範式的基礎。由《詩經》形成的成語一般都採用四字格的形式，如“赳赳武夫”、“求之不得”、“螭首蛾眉”、“求其友聲”；即使在《詩經》中原非四字格的形式，形成成語時也使之成為四字格，如“弄璋之喜”、“瓶罄壘恥”、“匍匐之救”、“千倉萬箱”。由於《詩經》的影響，先秦時代其它經書中的語句形成的成語也以取四字格形式為常，如出自《周禮》的“坐而論道”、“安富恤貧”，出自《禮記》

的“山頽木壞”、“難乎為繼”，出自《儀禮》的“老死牖下”、“寢苦枕塊”，出自《公羊傳》的“撥亂反正”、“無所不通”，出自《穀梁傳》的“不期而遇”、“馬齒徒增”，出自《左傳》的“善自為謀”、“生聚教訓”，出自《書》的“如喪考妣”、“捨己從人”，出自《易》的“赦過宥罪”、“數往知來”，出自《孝經》的“承歡膝下”、“推燥就濕”，出自《孟子》的“水深火熱”、“捨己芸人”，出自《爾雅》的“微乎其微”、“東南之美”。出自其他經書的成語，有的本為四字而逕被援用，如“母以子貴”逕源自《公羊傳·隱公元年》，“涅而不緇”逕源自《論語·陽貨》，“推燥居濕”逕源自《孝經·援神契》，“如釋重負”逕源自《穀梁傳·昭公二九年》；有的本身原非四字格卻被剪裁成四字格使用，如“泣血稽顙”剪裁自《儀禮·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成踊”，“難乎為繼”剪裁自《禮記·檀弓上》“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木本水源”剪裁自《左傳·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思不出位”剪裁自《易·艮》“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人們從《詩經》和《詩經》之外的經書中援用四字格形式而不大援用非四字格形式，將非四字格形式剪裁成四字格形式使用，這件事本身亦可說明《詩經》的四字格雅言範式對當時和後世的巨大的影響力。

四字格形成上的巨大影響力，也表現在《論語》這部儒家經典所創造的成語上。出自《論語》而被收錄在現代成語詞典中的成語有二百餘條，例如“當仁不讓”、“分崩離析”、“名正言順”、“披髮左衽”、“殺身成仁”、“以德報怨”、“有教無類”、“欲速不達”。《論語》在漢的五經、唐的九經和十二經、宋的十三經中雖然都未被列為首位，但它在統治階級、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社會上的影響卻遠在其它經書之上。《論語》中的語句以四字格的形式凝固成的成語，對後世影響匪淺。《詩經》、《論語》之外的先秦經書、子書、史書等中形成的成語，也多以四字格為基本形式，上文已給出例證。先秦之後歷代形成的成語也多以四字格為基本格式，可舉例如下：漢司馬遷《史記》中有“三寸之舌”、“面折廷爭”，班固《漢書》中有“相待而成”、“彈冠相慶”，晉葛洪《抱樸子》中有“魯魚亥豕”、“十室九空”，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中有“唐突西施”、“望梅止渴”，唐杜甫《杜工部集》中有“才過屈宋”、“慘澹經營”，柳宗元《柳河東集》中有“披肝瀝膽”、“黔驢技窮”，宋朱熹《朱子語類》中有“一刀兩斷”、“一了百了”，普濟《五燈會元》中有“弄巧成拙”、“葉落知秋”，元王實甫《西廂記》中有“文章魁首”、“杏臉桃腮”，元雜劇中有“演武修文”、“尋蹤覓跡”，明蘭陵笑笑生《金瓶梅》中有“同歸於盡”、“虛情假意”，吳承恩《西遊記》中有“搖身一變”、“庸醫殺人”，清曹雪芹《紅樓夢》中有“燕妒鶯慚”、“無法無天”，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有“豔如桃李”、“面目全非”。今天為絕大多數人認可的成語，所採用的格式就是四字格。《中國成語大辭典》^①收條目總數為17,934個，其中四字格的有17,140個，約佔總數的95.57%，這還不包括雙四字格形式，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事實上，雅文化與俗文化、雅言和俗語，一方面是彼此角力，一方面又相互交融。角力是手段，交融是目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也好，雅言和俗語也罷，從不和諧，經過磨合，達至新的和諧。在此過程中，詞彙並不判然涇渭，形成雅俗的對立，而是彼此交融，融匯到一處。如上所論，《詩經》可視為中國雅文化、雅言的源頭，但《詩經》在歷史上也曾被人抨擊為“誨淫誨盜”之作，飽受攻訐；《論語》是哀輯萬世師表語錄的經典，但“萬世師表”也好，“經典”也好，那都是孔子逝世後多年才有的事，孔子生前在衛遭誹謗，過宋險遭劫殺，他“困於陳蔡”，“累累若喪家之狗”，是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的言辭會有演變成為二三百條“成語”的殊榮的。《京本通俗小

說》、《清平山堂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先口耳相傳，是口語性的，而後加工成為文本，才具有書語性。一些講史話本後為文人加工成小說，更是口語加工為書面語的範本，體現了古語（多為雅言）和時語（多為俗語）的雅俗相融。徐時儀先生指出：“就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演變軌跡而言，在先秦口語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文言文可以說是由俗到雅，在秦漢以後口語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古白話則可以說是口語和書面語交融碰撞互為影響，在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雅俗合流基礎上有所甄選乃至捨棄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話語生態。”“從詞彙的角度來看，大量的詞彙成分既適用於口語，也適用於書面語，而從口語語辭到書面語文辭的擴展，體現了雅俗相融互補的自然過程，形成了口語和書面語並存不斷完善的語言發展模式。這種雅俗相融並存的不断完善，不僅是語言發展的模式，也是文學、思想、藝術和宗教等發展的模式。”^⑧

中國是禮儀之邦，語言典雅是謙謙君子們的表徵，但社會的基礎畢竟由大眾構成，大眾口頭上樂用的多是淺俗的話語。社會存在階級，文化就存在著事實上的高下之分，語言自然也就有雅俗之別。語言的雅俗是一對矛盾體，此消彼長，始終處於角力的狀態中。這種角力，有時會彼此交融，相互為用。例如，無論是唐五代的《遊仙窟》、《六祖壇經》、《秋胡變文》、《祖堂集》，還是宋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朱子語類》、《劉知遠諸宮調》、《張協狀元》，其中所用的語言，亦莊亦諧，有雅有俗。或許正是因此，那些著作才千年不朽，始終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歷史進入現代以來更是如此，魯迅、林語堂、梁實秋、沈從文、老舍等散文大家語言的使用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們的文章中，雅俗絕不自畫藩籬，以至彼此對峙，而是雅言、俗語信手拈來，為我所用，達出神入化之境。最近這些年來，人們創造新的四字格，似乎也不再顧及以往的套路，即：四字格是成語慣用的典雅的格式，俚俗的語體一般不會選取成語的格式去表現。最近網絡上出現的“不明覺厲”（雖然不明白對方在說什麼，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累覺不愛”（太累了，覺得自己不會再愛了）、“人艱不拆”（表示人生已如此艱難，有些事就不要拆穿）、“喜大普奔”（喜聞樂見、大快人心、普天同慶、奔相走告的縮寫）等看上去顯得怪誕的“成語”，或也說明，當代的人們更需要交往，加深理解，加強溝通，不必刻意拉大雅俗的差距，而使語言出現交際的鴻溝。

①如周荐：《在網絡詞語大爆炸時代，請“敬惜字紙”》，廣州：《羊城晚報》，2015年6月14日；閔大洪：《對網絡低俗語說“不”！》，北京：《人民日報》，2016年6月30日。

②針對俗詞語轉化為雅詞語的情況，筆者曾指出：“能夠變為成語的諺語，從客觀上講，一般都歷史久遠，而且在權威著作中出現過；從主觀上說，乃是語言發展到後世，人們比較前代的某個諺語，因其古舊不覺其俗反覺其雅所致。”周荐：《熟語的經典性和非經典性》，太原：《語文研究》，1994年第3期。

③高歌東等編著：《漢語慣用語大辭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④參見周荐主編：《“文化大革命”詞語辭典》，韓國大邱：中文出版社，1997年。

⑤王銘宇：《〈四字文箋注〉考辨》，上海：《辭書研究》，2014年第2期。

⑥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⑦王濤等編著：《中國成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

⑧徐時儀：《論漢語文白演變雅俗相融的價值取向》，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作者簡介：周荐，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責任編輯 桑海 李俏紅]